

容闳与中国近代政治

甄艳萍

摘要: 容闳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 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 由于容闳一生的追求和主要成就是促成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 因此又有“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

关键词: 容闳; 政治

容闳, 原名光照, 族名达萌, 号纯甫, 英文 Yung Wing,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 1828 年生于澳门, 家境贫寒, 渔农为生, 因“吾父母欲先着人鞭, 冀儿子能出人头地, 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 入美澳门玛利逊学校读书。1847 年随该校校长布朗博士赴美留学, 1854 年以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回国, 怀抱“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伟大理想, 开始了他的改造中国, 使中国走向近代化道路的艰难生涯。

从 1854 年回国到 1902 年归美, 容闳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急剧变迁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容闳以其坚定的社会理想和抱负为宗旨, 投身其中, 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多种进步

者, 也是财务报表信息的法定使用者, 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给出合理地判断, 无论是形式上的独立, 还是实质上的独立, 最终都应当要得到投资者的认同。安然——安达信事件之后, 人们才发现安然不仅是安达信最大的客户之一, 而且非审计收费要远高于审计收费, 如果这些咨询业务信息能够被及时披露, 安达信在安然的审计中就很难保持一种公众所期望的形式上的独立, 其提供的审计报告也不可能产生很高的公信力, 问题也随之会被及早发现, 以免更大的损失。

(二) 加强监管机制, 保持管理咨询与

力量相互联络和切磋, 希望以此来实现他的理想抱负。

一、容闳与太平天国运动

1855 年, 他在居住广州期间, 正逢两广总督叶名琛“假公济私, 以报其宿怨”, 在广州镇压民众暴动。这次耳闻目睹的惨剧不仅使容闳初次体验到中国官吏的恣意妄行和政治黑暗, 也为容闳后来到天京(南京)访问洪仁玕作了思想铺垫。

1960 年, 带着“太平军之性质若何? 其举动志趣若何? 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州乎?”这样的疑问, 他和两位“拟作金陵游, 实探太平军内幕”的美国传教士到了太平天国首府天京, 拜见了干王洪仁玕, 并向他提出了七条建议: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组织一良好军队; 二、设立武备学校,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三、建设海军学校; 四、建设善良政府,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为各部行政顾问; 五、创立银行制度, 及厘定度量衡标准; 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容闳认为当时即使没有洪秀全, 中国也不能免于革命。“恶根

审计业务的相对独立

目前 SOX 法案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不能同时为一家客户提供审计服务和管理咨询服务, 但是, 会计师事务所仍然可以保持分拆的管理咨询业务。这样, 会计师事务所就既能介入利润高、风险相对较低的管理咨询服务, 以保持会计职业的发展, 又能限制事务所借助法定审计业务的影响力拓展非审计服务市场, 并防止审计服务的质量受到非审计服务的影响。

(三) 适当采取其他手段

为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在今后的执业过程中, 不出现一些“精心安排”的违规现象

实种于满州政府之政治, 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 政以贿成。上下官吏, 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洪秀全只不过是利用宗教为旗号, 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满州的统治, 而民众“亦未免感情用事, 过于信任太平军矣。”“至若于中国政治上, 则更绝无更新之影响。”

虽然容闳与太平天国革命关系仅此一段, 但是对于容闳日后的设想和建议却是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且能一针见血的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真正原因和对其必然失败的预见, 可见容闳的政治远见。

二、容闳与洋务运动

容闳在洋务运动的主要表现就是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完成和派遣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留学这两件事上。

1863 年, 由于容闳在上海所结识的李善兰的推荐, 曾国藩在安庆接见了容闳。曾国藩对容闳表示赏识, 容闳则认为曾国藩“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对于博学多才之士, 尤加敬礼, 乐与交游”, “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 汇集于此”, 故视曾国藩为“清代第一流人物, 亦旧教育中之特产

和“不经意”中“拓宽”的法定审计服务范围, 如将非审计服务打包进入审计服务, 一方面, 监管部门应当切实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管理; 另一方面, 逐步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的风险,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防止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下降的可能。正如美国著名审计学家莫茨所指出的: 禁止独立的公共会计师开展管理咨询业务都是错误的, 同时, 如果注册会计师毫无节制地自由开展这项活动, 也是危险的。恰当的方式应当是, 由会计职业界在法律等框架的约束下, 通过市场竞争来自由选择。

(作者单位: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人物”。由于容闳事前已从李善兰等人处得知曾国藩邀他为了商量办机器厂一事,故他在回答曾国藩“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事业,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时,暂时不提心中酝酿已久的培养人才的教育计划,而答以购买“制器之器”,建立机器总厂的设想。“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枪炮之各部,配合至为复杂;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枪炮之于中国,较他物尤为重要。”于是曾国藩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委其携款赴美国购置机器。1865年容闳完成了采购机器的任务,从而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完全建成,并向曾国藩请求在其附近设立“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这样就摆脱了外国在科技和人才方面对中国的控制。容闳在一百多年前,就意识到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由此可知他的远见卓识。容闳因完成购买机器一事获五品实官、候补同知资格,任江苏抚署译员。

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文祥提出四条建议,请其代奏。这四条建议是:“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政府宜选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当然,“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毕生心愿的容闳对于此条陈的侧重点是第二条。“此条陈止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这个条陈因种种原因未见回音,直到1870年才由曾国藩等专就派遣留美幼童一事上奏获准。1871年开始招生并集中在上海补习训练,次年夏末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启程出国。从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四百一二十名学生赴美留学。这在我国教育史上,完全由政府正式向外派遣留学生,还是第一次。而“政府之所以有此举,则完全于容闳一人之力”容闳担任中国留美学生副监督,从1875年还兼任驻美副公使。

容闳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和思想上的倡导者,但他并不是洋务运动的实权派和决策人物。事实上,容闳自1863年入曾国藩幕,开始进入中国政界起,他的位置就已被确定下来,即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上,成为一个做高官而又是一个只用“一技之长”的人。只能说容闳与洋务派在思想有共通之处,容闳期望通过在当时掌握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而洋务派则通过这个精通外语、熟悉洋情的中国人达到他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目的。容闳是希望通过全面学习西方,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理想,而洋务派则是想通过学习西方的某些科技来维持中国原有的封建统治,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对容闳是既重用而不信用,从任命容闳为留学副监督和驻美副公使就可以看出端倪。

三、容闳与维新运动

随着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中途召回,容闳的以“教育救国”的理想破灭,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他认识到“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盼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对清政府的失望使他产生了对清朝实行根本变革的想法,最后走上维新道路,是必然的结果。

容闳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开始于1896年,他参与了“保国会”的成立;他认为光绪帝“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百日维新期间,他的寓所是维新人士常去聚会的地方;政变前后他曾参与营救康、梁,事后自己也被追究撤差。1900年以后容闳和康、梁仍有联系,梁启超、康有为在1903年、1905年访美时分别与容闳见过面。在这之后容闳才谴责康有为把所得捐款中饱私囊,称康有为不是一个靠得住的维新者,认为“康有为内心更加关注的是中国政治权力、权势和财富,而不是改造中国。”也不再赞成康有为及其弟子的保皇主张。

四、容闳与辛亥革命

在容闳被通缉逃亡日本的途中,在轮船上与孙中山巧遇。孙中山阐明了必须推翻清政府,中国的改革才能实现。这使容闳很受启发,一系列的失败也告诉容闳,在现存的清政府的统治中,依靠一个阶层去推翻另一个阶层,实现改革中国的目的很难达到。在对康有为失望之时,他更加

拥护和支持革命,与孙中山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认为孙中山才“最可信赖”1909年底,孙中山到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按约定与容闳见面,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推翻清政府,容闳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准备筹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为反清武装起义所用。1910年2月,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告诉他实施“红龙中国”计划的具体安排,并约他与两名美国友人会晤,商谈借款事宜。孙中山与他们多次磋商,确定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但是因为美国金融资本家不肯冒险借款,计划夭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容闳虽在病中,但他仍然只以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为念,曾接连写下了5封信寄给国内友人,庆贺革命的初步胜利,并建议应该迅速建立政府,避免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应坚持革命原则。他还强烈谴责袁世凯说,“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齐撵走”;又指出“掠夺成性的列强”并未放弃“干涉”和“瓜分”中国的政策,尤其可能“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那简直就如同满清政权重新执政一样糟糕”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致信容闳,高度肯定他对祖国的贡献和种种宝贵见解,请其回国。但容闳已经病重,未能成行。他临终前还嘱咐两个儿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

回顾容闳的一生,爱国主义始终贯穿其中。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位倾向或参加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等社会运动,与历史潮流同步的志士。正如他的外国友人评价他那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东方出版社,2006.
2. 杨国标.美国华侨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3.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M].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